

莫言

如果写小说是过大年，
那么写散文是我的春天，
对谈就像在秋日

对话新录

莫 言

如果写小说是过大年，
那么写散文是我的春天，
对谈就像在秋日

对 话 新 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对话新录/莫言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莫言心声系列)

ISBN 978-7-5039-4109-2

I. 莫… II. 莫… III. 莫言—访问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1320号

莫言对话新录

作 者 莫 言
责任编辑 李春阳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wx-design
版式设计 杨林青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3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3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33.75
字 数 520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4109-2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 / 1
现实主义一直是文学的主流 / 176
作家进校园对作家和学生都是好事情 / 182
我写小说，小说也写我 / 185
说不尽的鲁迅 / 191
谈谈媒体与文学的关系 / 226
身体的痛苦与快乐 / 229
我想做一个谦虚的人 / 232
我的离经叛道 / 236
我对媒体有一种恐惧感 / 242
中国当代文学边缘 / 249
发明着故乡的莫言 / 258
写小说就是过大年 / 266
饥饿者的自然反应 / 279
关于男人和女人 / 284
每个人有自由选择态度与权利 / 288
不同民族要能相互理解 / 294
重建宏大叙事 / 304
茂腔大戏 / 312
追忆与青春 / 322
第一次来北海道 / 329
写作时要调动全部感受 / 337

小时候的年 /	353
莫言谈动物 /	365
谈谈战争 /	372
谈谈孤独 /	375
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人物 /	378
作家之间可以相互理解 /	385
先锋·民间·底层 /	390
故乡·梦幻·传说·现实 /	404
用自己的腔调说话 /	429
我认为我是必要的 /	435
小说的写作 /	440
作家需要加强技巧 /	455
童年记忆 /	458
中国作家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	462
耳朵的盛宴 /	468
写什么是一种命定 /	474
作为老百姓写作 /	490

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

——2002年12月与王尧长谈

童年记忆

王尧：秋天我曾经想去北京访问您，做完这次对话，也很想到您家吃羊肉水饺——听说你请一对夫妻吃饭，那丈夫不吃水饺，那妻子不吃羊肉，但你们家却包了羊肉水饺？

莫言：很抱歉，我认为羊肉水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不吃？事实证明，后来他们都还是吃了。

王尧：转眼就是新年了，还要劳驾您到苏州来。我想，我们争取在圣诞节前做完这一对话。说是对话，主要还是想听您的高见。我知道，您不太喜欢说“思想”、“知识分子”这类词，这不要紧，我们就随便地漫谈吧，谈谈往事，谈谈天气。

莫言：“思想”、“知识分子”，在这些词汇没有准确定义之前，还是不谈为妙。咱们还是“今天天气哈哈”吧，不过，我真怕这样的废话整理出来，既浪费纸张，又贻误读者。

王尧：也许用这样的态度，会谈出一些好玩的东西。

莫言：好，权当聊天。即便将来你整理发表，也只允许你用马粪纸印刷。

王尧：好，我们印在马粪纸上——您昨天来苏州时看我的眼光和以前不一样，等到后来您说这次发现我有点老的时候，我才知道了原因。我现在也发现自己头发白得越来越多，气色也有些苍老，似乎很难摆脱一脸的疲倦。我父亲的头发基本上白了，但在父亲身上看到人老了以后的童真。人有两次童年，一次是少年之前，一次是老年以后。我和您的第一次童年已经遥远了，

只有在记忆中才是近的。冬天特别让我想到童年，那时的冬天太冷了，冷得直发抖的样子，我到现在想起来都发抖，而且是饥寒交迫。您也有这样的经验。人对童年时饥饿和寒冷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童年生活应该说对自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故乡的小巷子就是自己的血管，稻草就是自己的头发。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一定影响自己后来心理和精神历程的创作。

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好像只有当你成了所谓的作家以后，这个童年才显得特别重要，我想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最初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也就是人生的出发点。所以故乡、童年这几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可以综合起来谈。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似乎还没有资格来谈童年，谈故乡，仿佛一坛酒，窖藏的年头还不够，强行开封，滋味就不够醇厚。这种半自传性的谈话，应该再老一点，到八十岁了再谈比较合适。

王尧：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立场和记忆、想法，而且童年中的一些部分其实已经被我们遗忘。

莫言：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一个现象，就是眼前发生过的事情可能马上就忘记了，上午发生过的事情下午就记不大清了，两天以后可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但好多20年前，30年前，甚至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牢牢的，这说明人到了这种状态，起码是步入中年了，甚至是老年了。

王尧：趁现在还记得牢的时候多说点，免得以后让一些学者来考证。有些事情不说，会以讹传讹。

莫言：好吧，那就厚颜无耻，自己抬举自己，先把自己幻想成一个似乎可以立传的人物，像阿Q一样。我首先要谈的，是纠正一个年龄方面的谬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一直到90年代以前，需要写作家简历的时候，出生年月都是写1956年3月25日，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日期，涉及到我个人当兵提干的一段经历。几十年前，在农村，当兵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六七十年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从理论上讲，中农的孩子也能当兵，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贫雇农子弟都在那排着队等候，哪里轮到你？我从1973年就

开始报名应征，每年都参加体检，心心念念地想当兵，但每年都落空。一直到1976年，趁着村子里的干部带领全村人到外地去挖河，而我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钻了个空子，偷偷报名，成为一条漏网之鱼，“混进了革命队伍”。此时我的年龄已经是21周岁，21周岁可能是当兵的最后年限了。到了部队，年龄是自己的一个压力，因为那些新兵比自己小两三岁。我一个新兵，21岁了，比班长年龄还大。一提到年龄，就觉得很羞愧。

王尧：后来就改年龄了。

莫言：1980年要提干的时候，因为超龄一岁，提不了。提干的最大年龄是24岁。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干部部的一个干事，常州人，这个老大哥，给我一个暗示，说，年龄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们农村兵的年龄，很少有准确的，你们的年龄，你们的学历，都是随便填的。当然他也没说得很明确，只是暗示，我自然心领神会了。

王尧：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不仅在部队，在哪个行当里都有这样的现象，我们的政策中常常有“年龄杠子”这一条，有了这一条，好多事情就会一刀切。那个时候好改，出生档案不健全。

莫言：农村孩子出生，在自家炕头上，祖母就是接生婆。你生了孩子，就到当时的人民公社，找民政助理，报上个户口，有的拖了好几年也不报户口。人民公社后来撤销，改成乡镇，变动很多，所谓档案，都是一把火烧掉了，谁帮你保留啊，不可能保留的。我就跑到乡里面，找了个朋友，开了份证明，改成1956年3月25日出生。那个人笑着说，你们这些闯外的，都回来把年龄改了。大栏村老钱家的大儿子，明明是1950年生的，一下子改成了1958年，比他弟弟都小了，你是不是也多改几岁，改成1960年怎么样？省得将来再回来改。我说，改成1956年就行了。事实上，现在那些干部们的年龄，都改小了许多，上边有政策，下边有对策。如果我走仕途，改成1960年，真会占很大便宜。我们这些人最早的档案，也就是当兵时的入伍体检表，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之前就是空白，你想怎么填就怎么填。后来经过准确查证，我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55年2月17号，那年正好是农历的羊年，正月二十五日。

王尧：当时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想想，又不安了。

莫言：后来提了干，当了作家，老觉得瞒了年龄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感觉是在欺骗世人，欺骗同志，再后来在出书时就把年龄改过来了，但身份证上还是1956年。现在要改身份证，那可就非常麻烦了。把这事回家说，他们都笑，说这算什么，老钱家的儿子，已经把出生年龄改成1960年了，最近作为青年干部被提拔成了副市长，如果照实际年龄，他都该退休了。这也不能说我品德好，如果我也在官场上混，没准儿要改到1965年出生。

王尧：母亲对孩子的出生时间是记得最清楚的。

莫言：据我母亲说，天将破晓的时候，哪个时辰也搞不清楚，鸡叫头遍。

王尧：生您的时候，你们家已经是个大家庭。

莫言：这个时候，我家庭里面有很多人，我爷爷奶奶都还健在，很年轻，也就五十几岁，我父亲母亲，我上面已经有大哥、二哥、姐姐，叔叔和婶婶与我们没分家。我婶婶已经有一个女孩，比我大四个月。

王尧：我想现在应该说到你爷爷了。你1985年前后的中短篇小说，常常喜欢用“我爷爷”这样的提法，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大风》就是讲“爷爷”的故事，这当然是在写小说，但生活中你爷爷肯定给你很大影响。

莫言：是的，要说到我爷爷。这个老人，现在想起来，很有性格，比较有远见，但非常固执，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不会随潮流，杠子头，钻牛角尖，撞到南墙也不回头，永远是和社会对着干的。互助组时他还可以接受，邻亲百家互相帮助嘛，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取消个人资产，集体化，他就难以接受了，心里面非常抵触。他认为一家一户，两个兄弟，都要分家，不分家就没有积极性，妯娌之间互相都计较，兄弟之间各自想着自家的小家庭，很少能够同心协力地干好一件事，一个大家庭维持很久是不可能的，亲兄弟都不行，这么一帮邻居，一帮互不相干的人合到一块干活怎么可能干好？谁会卖命地生产呢？谁能够把自己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呢？但是当时社会潮流是这样啊，你如果作为一个单干户，不入社，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你和后代的前途就给断送了。

王尧：“文革”后期，我经常帮大队干点事。一次，部队来函调查一位战士的家庭情况，大概准备提干。大队领导让我回函，先是说好话，后来让我写上一句，他爷爷在入社时不太积极。

莫言：我爷爷对我父亲说，入社入社，扯淡造孽，你们入吧，我不入，坚决不入。但我父亲是一个相当开通的、追求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解放以前读过四年私塾，算盘打得很好。1947年共产党一过来，就给共产党做事，征粮、算账，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直到1984年，干了几十年会计，账目上没出一点差错，没贪污过一分钱，对共产党确实是忠心耿耿，对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共产党的那些干部，提起来就赞不绝口，讲当时那些干部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吃苦耐劳的精神。当然后来那些干部越变越差，他的信心也在打折扣。我父亲心里面是有人党这个梦想的，非常希望入党，共产党让他上刀山、下火海，他不会有半点迟疑。但这样的一个家庭出身，富裕中农，大伯又是地主，入党是不可能的。他小心谨慎，勤勤恳恳，白天下地劳动，账目晚上算，全县的大队会计都是脱产的，只有他不脱产，但人家还是不把他当做自己人，他确实是希望进步，希望子女入团、入党，到外面工作。在那个时候，我爷爷不入社，对我父亲造成了很大压力，但对我爷爷又不敢发火，只能好好劝说。

王尧：还有像你爷爷这样的人吗？

莫言：邻村有一个姓孟的单干户，死不入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不入社，其中一个，头上还留着小辫子，像满清遗老遗少。国家政策规定自愿入社，我不愿意入你不能强迫我入。单干户老孟，他的两个孩子也不上学，后来小儿子上学，在学校里备受歧视，找对象都找不到的，谁愿意嫁给单干户家？不识时务，天生一种顽固不化的形象。他们推着木轮车去推粪，生产队是马车，胶皮轱辘小车，他还用木轮车。木轮车一走就吱吱地响，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单干户来送肥了。前边小毛驴拉着，儿子后来也不帮他干了。他的老婆给赶着毛驴，他老婆是小脚，后边一个男的留着干豆角一样的小辫子，推着一辆破破烂烂的落后了几十年的木轮车，车上装着两篓子粪，往地里走，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目不斜视，老婆在前面也目不斜视，赶着小毛驴，沿着河堤往前走。

王尧：乡村里也有像王国维这样的人啊？

莫言：当时生产队非常贫困，但很热闹，队长一敲钟，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说说笑笑，干活就大呼隆。全队五六十号人到地头抽烟、说故事，他们一家俩儿子就跟着爹、跟着娘在远离群众的偏僻地方，弄那么一小块土地，庄稼长得又不好，他也不用化肥，用化肥就和共产党、和人民公社沾边了。他不跟共产党、不和社会犯事，洋布、胶鞋都是人民公社的，他们家不穿。化肥、农药也是人民公社的，他拒绝使用。

王尧：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来拒绝这个社会？

莫言：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他用原始农家肥，坚持几十年前的生活生产方式，煤油都不点，点豆油，过去都是点豆油嘛。自家织那个老土布，他们家孩子都穿老土布，当然现在都是好东西了。他很怪的，他就是对这个社会极端地抵触，家里很贫困，是贫雇农，你也不能怎么着他，出身好，要是地主早给打死了。

王尧：在我们以前的当代史里面，我们往往忽略不计这些人和事。

莫言：这种人是很值得研究的，要不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很早觉悟的大智者，要不他就是一个冥顽不化的落后分子。我爷爷的个性中也有这种东西。他知道你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我爷爷在中苏友好发高烧的时候也说，“好成个什么样子，将来就会坏成个什么样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人抖出来，说他讲“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是攻击社会主义。

王尧：我们以前的社会学者缺少这种调查。

莫言：以前很多社会学者调查一个村庄，但没有注意这样的活化石一样的个体户。

王尧：这户人家后来的命运怎么样？

莫言：他从互助组开始就不合作，自己单干。我想其实他是太迷恋土地，自家的土地，那种感觉，非同一般。后来，县里要修路，他的地正在当冲，就

变成了修路的巨大障碍，县里派人做他的工作，让他让路，他就说这是我的土地，是共产党分给我的，土地改革的时候分的，地契都有，共产党还是不是那拨？如果不是那拨了，我让，如果还是那拨，就必须讲信用，说话算数，这个地就是我的，我就是死活不动。县里也拿他没有办法。正好马上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就不管这套了，把老头拉出来批斗，脖子上挂砖头，身上抹大粪，招来的苍蝇，把身体都遮没了。批斗的当天晚上老头就上吊死了，老婆也很快郁郁而死。儿子立刻就加入了人民公社，儿子感觉到真是解放了，马上融入到这个集体里去了。过去他儿子见了人，就像老鼠见了人一样的。

80年代以后，我到县里去，当时贫下中农协会那个主席，后来是宣传部长，我就提起了我们邻村这个单干户。我问，60年代时，这个县里边还有没有这样的单干户，多不多？他说，整个高密县就你们老家旁边那个陈家屋子村有这么个单干户，全县的典型，好像县里为这个还做过研究，说这是个耻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个单干户，要不要采取什么强制措施。县里边开常委会也没做出决定，人家也没犯什么法啊，你看那人民公社条例上规定了“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为此还专门请示了省委农村工作部，省委批复说就让他单干好了，人家确实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规定，是合法的。

王尧：虽然合法，但这个人在社会中被真正地边缘化了，排除到社会之外了。

莫言：理论上讲，他的儿子也能上学，也能参军，但实际上他是完全失去了这种可能。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很善良很耿直的人，儿子也长得很漂亮的，但没人嫁给他。等父母亲死了，他们融入集体，才找了个有残疾的女人结婚。

王尧：你说的这些事情，让我想到柳青的《创业史》。你爷爷这么固执，你父亲总得做他的工作，这是潮流啊。

莫言：后来还得说服他，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单干，否则我父亲就没法在外边混了。我爷爷就和我父亲讲价，我入可以，但家长不是我了，我辞去家长职务了，从今之后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也不会和人民公社里干一天活，我不干。他是当地有名的农民老把式啊，干农活是很能干、非常厉害的，无

论是推，还是割，所有农村的技术活，他都干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尤其是割麦子。割麦子实际上在农村是会友炫技，像武林中人炫耀武艺一样。

王尧：浩然《金光大道》里就有拔麦子比赛。

莫言：浩然写张金发和高大泉他们比赛拔麦子，拔麦子实际上是一种较量，技巧和体力的较量，就像比武、会友。我们那里的土质是一种黑土，不可能拔麦子，拔不出来，土壤板结得厉害，要用镰刀割麦子。用镰刀割麦子要有很高的技巧，我爷爷割麦子的技术在方圆几十里、在整个高密东北乡鼎鼎大名，很潇洒。我们那儿是洼地，到了秋天是一片汪洋，水落下去，种麦子，不可能让驴下去拉着耧，正儿八经地耩，只能人下去，用脚后跟踩上两个脚窝，前面踩窝，后面点麦种。虽然是这样粗放地播种，但到第二年，麦子还是长得特别好，因为秋天的大水使河水泛滥，就像尼罗河的河水泛滥必然带来第二年的大丰收一样。我们村后面的胶河，每年秋天泛滥，必然带来第二年小麦大丰收。胶河的水从上游带来的含有丰富肥力的黄土和沙土，退水以后，黑土上面蒙上了一层大约一公分厚的油光光的黄泥，翻到地下就能起改良土壤的作用。本来那土壤含碱的，含碱的土壤被河水一浸泡、一冲洗，就把碱给压下去了，所以第二年麦子长得是密不透风啊。当时种的时候是一墩一墩的，所以割麦子的技巧很讲究，割欸把，就是镰到手到，如果你想用手先揽住麦子再用镰刀割的话，那速度就慢了。镰刀向麦子根伸过去，手同时向麦穗脖颈处伸过去，镰刀把麦子割断的时候，手也把麦子抓住了。抓住以后，技术差的人就把割下的麦子夹到两腿之间，然后再腾出手来抓另外一把。年龄再老一点的就蹲着，一条腿支着屁股，一条腿往前移动，割下一把就放在一条腿缝里边夹着。我爷爷这种高手呢，就用手攥着，割这把麦子的时候同时把麦腰子打好，割的同时就把麦子揽起来了，割到半个麦子的时候，啪，往地下一拢，紧接着用镰刀把那个地方一缩，就是一个完整的麦个子。我们割麦子要换上最破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把袖口、裤腿扎起来，我爷爷看了就冷笑，他割麦子的时候，穿着很板的白褂子，用手挽一下袖子，人家身上根本没有灰尘的，看他割麦子真是一种享受。

王尧：《大风》写到“爷爷”割麦子，很简单，没有你现在描绘的这样传神。和你对话时，我才感受到“叙述就是一切”，和别的作家在一起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

莫言：我们那个地方是洼地，麦子成熟得比较晚，当我们那儿麦子成熟的时候，上坡，就是岭地的麦子已经割完了。所以我爷爷说麦子是从西边渐渐地往东成熟。这个时候，我爷爷他们，当然这都是解放前、解放初期，以我爷爷为首的高密东北乡的割麦高手，穿着白色的纺绸褂子，拿着镰刀，背上斗笠，到上坡去，给别人打短工割麦子。有一个地主，邻居家的大地主，开着烧酒锅，青岛都有买卖的，在麦收前夕叫上我爷爷，“老二，怎么样，我们到上坡开开心去？”他们不说到上坡去割麦子打短工，而是说开心去。到了上坡，也在工夫市上蹲着啊，等人家来雇。后来人家那边也知道了，知道了我爷爷他们这些来自高密东北乡的割麦高手，不是来挣钱，而是来开心的，于是就抢着雇佣。所以有些事情很复杂，像我家是富裕中农，我邻居家是大地主，他们也去当雇工。他们是真干，当地地主家都有好把头，领着割。如果跟不上，或者割得质量不好，是拿不到全额工钱的。有一年他们被一个寡妇家雇去，寡妇家很富，就一个儿子，继承下来很多土地。寡妇家请来一个把式，割麦子的高手，瞧不起高密东北乡来的这帮短工，口出狂言，你们这些黑土地的蝼蛄，到我们黄土地，只怕拱不动了。把头很轻狂。我爷爷他们不吱声，说，割吧割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吧。据说那个人力大无穷，但是没有技巧，被我爷爷他们一会儿就追到了屁股后，故意不超过他，就在他后边，割一把就用麦芒子扫他的脸一次，割一把就用麦下面的根戳他屁股一下子。半晌午的时候，这个把头双手作揖，说，得罪了。让出这个位子，到了地头，背上自己的包袱就走掉了，饭都不吃。

王尧：还有比你爷爷他们厉害的吗？

莫言：我爷爷他们是真正的高手，他实际上技术已经很好了，但他说自己还不行，真正的高手都是提着画眉笼子，摇着芭蕉扇，身后跟着跟班的。镰刀的柄上镶着象牙。都是大地主，大地主也会干活？其实很多地主都是干活

高手，从小劳动出来的。劳动过程当中，他们实际上也体验了很多乐趣，他出来打短工是寻开心，过瘾，在地头上吃饭也是很开心的。

王尧：这和以往小说中的叙述以及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记忆不一样。

莫言：过去小说里面，阶级教育当中，都是说给地主家扛活，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牛马圈，而东家在一旁喝酒吃肉。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起码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这长工、短工，要是伺候不好的话，是不好好给你干活的。我给你把麦子多掉一点，我给你把麦子的茬子割得高一点，不就浪费掉了吗？实际上都会把家里最好的做给短工吃，自家反而舍不得吃。我们那个邻居地主家请来了雇工割麦子的时候，地主的太太、儿媳妇在家里面做最好的饭，擀饼啊、包包子啊、擀面条啊，然后炒菜啊，送到地里去，早饭和午饭没有酒，怕喝多了耽误营生。晚饭，酒随便喝，他家开着烧酒锅，酒有的是，都是好酒。有些吝啬的东家，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把最好的给长工和短工吃，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样做是为了收买人心，让他们出大力，更多地剥削。我奶奶说，我们那邻居家，为了让长工帮着吃吃粗面，儿媳妇想了一个办法，用粗面包肉包子，长工吃着很高兴。这就是说，给长工吃粗面，长工是不高兴的，必须加上很多肉，逗引着他们吃。给那户地主家当过长工的，最后都跟那家感情很深，以至于发生了这样的怪事，1947年，他家的一个长工，回来组织了还乡团，给东家报仇。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长工是贫雇农的叛徒，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确实有像黄世仁那样的欺男霸女的恶霸地主，就像我们不能否认现在的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中有无恶不作的坏蛋一样。

王尧：所以，千篇一律的叙述总是让人怀疑的。当所有的叙事都变成一种阶级话语时，一些现象就被遮蔽了。这种日子，可能是你爷爷苦难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这是70年代的另外一种忆苦思甜。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我的爷爷、奶奶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常常怀念的就是过去的日子。

莫言：我爷爷也怀念过去。尤其是70年代的时候，晚上经常给我们讲，想想那时候太阳那么毒，白日头，地都晒焦了，地上的土都烫脚，麦田是一片金黄，麦子眼看就要断穗了，晒得上面麦秆要焦了，一动，麦粒就啪啪地落下

来。满鼻子都是麦子的焦香。劳动间隙坐在地头上休息，天上全是鸟在叫，周围野草野花开得茂盛，蜜蜂飞来飞去，财主家的小伙计把饭挑来了。饭里边最怀念的，就是单饼卷鸡蛋，卷大葱，后来我在《红高粱家族》里边写过单饼卷鸡蛋，然后就是猪头肉、蒜泥拌黄瓜。五月份，黄瓜刚下来，顶花带刺的小黄瓜，红烧猪头肉，加上大蒜、酱油一拌，那滋味，嗨，我爷爷说得我不断地咽口水。我们兄弟几个，特别喜欢听我爷爷这样的老人，讲述他们过去吃过的好东西，精神会餐。我奶奶就反对，说别说了，再说他们就更馋了。

王尧：现在山东一带还有这个菜，黄瓜拌猪头肉？

莫言：现在还有，但现在感觉没有那么好吃了。

王尧：吃东西就是这样，总觉得困难时期的饭菜特别香，这不是味觉，是一种心理感觉，还有一种莫名的东西在心头。

莫言：劳动一上午，送饭到地头，喝上一碗绿豆汤，黄瓜拌烧肉，单饼卷鸡蛋，真是吃得开心，被他一描述，我们就馋得流口水。吃饱了往地上一躺，迷糊一袋烟工夫，头枕着麦个子。也是一种幸福吧。六七十年代生活那么困难，就是红薯干、高粱面、窝窝头。我爷爷就怀念当年干活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第一，劳动本身是充满乐趣的；第二，农民也有自己的敬业精神，他干不好活，是很耻辱的，割一手好麦子，刨一手好地，他自己也很骄傲，而且也能赢得周围老百姓的尊重，瞧人家干活像模像样的，干什么是什么。

王尧：你说的是一种“劳动美学”。

莫言：这种劳动模范，在农村是很受尊重的。我从小就笨，干活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是个劣等的农民。而那些有天才的孩子，根本不用学，看一眼，就会了。我是把着手都教不会的主儿。我爷爷也批评我说，你这个样子，要是放在过去，别说挣工钱了，谁给你工钱啊？自己背着干粮，白给人干也没有人雇。我想一个好农民，也是天生的，学也不行，只有一身蛮力气，没有技巧，心不灵手不巧，做个好农民都不够格。我爷爷除了农活做得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木匠。人民公社以后，他发誓不给生产队干活了。生产队的那些人，

队长啊、村长啊，动员他，有喊他二爷的，有叫他二叔的，因为他排行第二嘛，你能不能来带带那些年轻的，不用你干，就给他们指点指点。他说，不行，我不干。你能不能露两手看看？不行，坚决不干。农村都有自留地的，自留地的活我爷爷还干，在自留地割麦子，好多人来看，他的割麦子成了表演，很潇洒，他也很得意。他的镰刀磨得好，看不到手和麦子是怎么接触的，真是一柄大镰四面挥，眼前高麦立纷披。后面一穗都不掉的，麦茬子贴着地皮。低手割麦，那是滴滴落落的，像羊拉屎，掉得满地都是麦子，后面还要人捡麦穗。他后面是干干净净的，真是好。麦个子放在地上，两头膨大，中间紧束。麦穗子齐齐的，真是好看。自留地里那点活根本不够干，我们那里有些无主的荒地，他就去开小荒，但很快就被制止了。宁愿荒着长草，也不能让个人开。只好耍木匠手艺，当时做木工活也是违法的呀，而且也没有木材，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全给糟蹋光了。我记得我爷爷就是收购一些破家具，破门、破窗，烂得不行了，或者一块木头头、木板，他都捡回来，捡回来他就因材施教，什么样的材料他就给你搞出一个精致的小家具来，一块弯弯的木头他可以给你做出一个小凳子来。

王尧：后来你写过一篇小说《枣木凳子摩托车》，说凳子不是用来坐的，而是用来枕头的。

莫言：是的。我们家有一棵老枣树，我爷爷用它做了几十个小凳子，小凳子就是那种窄窄的、翘翘的，元宝形状的。我爷爷他一辈子不枕枕头的，他枕着小板凳睡觉，他的小板凳最后被他的脑袋磨得油光光的，像鸡血石一样，红色的，油光光的，枕着睡觉，冬天夏天都是。夏天他在树下边铺上一个蓑衣，枕着一个小板凳；冬天他也不枕枕头，一辈子枕个小板凳睡觉，他的脑袋后边坚硬无比。有什么东西他都给你做得很好的，真是没有他不会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叔叔家的儿子捉了一只小鸟，是只云雀，那时我爷爷年纪也大了，我叔叔家的小男孩也是最小的一个，要爷爷做个鸟笼子，我爷爷说鸟笼子没做过啊，它怎么做啊。他就天天跟在他后边，要做个鸟笼子。我爷爷说，好，我给你做个鸟笼子。他就下面用木头串起来，上面是渔网形状的，他会结渔